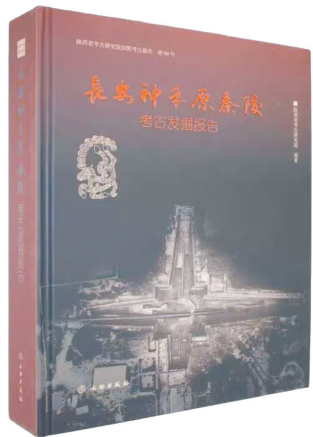


2026年4月18日

《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读后

田亚岐



以错金银、鎏金为特色，体现出陵园的高规格墓制和墓主的高等级身份。以神禾原秦陵与秦始皇陵做比较，这里的布局结构也依然显示着当年建造陵园时拟仿照都城咸阳的“若都邑”“事死如事生”之理念，试图表现秦要构建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地下帝国的愿望，尽管两者有规模之别，但营造理念如出一辙。

关于墓主身份的判断，报告在强调发掘团队的主要观点之外，对于学界不同观点和认识予以参考尊重。首先基于墓葬时代为战国晚期的认同，先后提出了墓主是夏太后、秦二世和周赧王等三种不同观点。在发现之初，著名考古学家韩伟先生就提出其可能与秦二世胡亥有着微妙的联系。因为车马坑有“天子驾六”和“黄肠题凑”木椁室（高等级葬具）的随葬品，以此来彰显墓主人不同凡响的地位，发现“衡”字铭文标识和采自盗洞“宜春”陶罐均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中秦二世葬于杜南宜春苑相吻合，而神禾原大墓恰好就在宜春苑以东偏南的位置。不过，这一说法与文献记载仍有偏颇之处，因为秦二世执政后期被赵高所逼迫自杀，并且潦潦草草下葬，因而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等级的墓葬。根据随葬器物“五十九年”的铭文，学者曾联想到周赧王在位的情景。周赧王姬延（公元前336年至前256年），东周时期最后一位君主，由于周王室衰微，他将王都从东周都城成周迁到西周都城王城，虽有天子称号，地位却一般。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曾联合诸侯攻打秦国，反被秦国所灭。周赧王虽在位时间长，但其晚年遭遇颇为凄凉，且并未有资格享受如此规模的陵墓。况且墓葬结构与西周时期的传统特征不符，使得这一猜测逐渐黯淡，因此墓主为周赧王之说也不成立。考古团队基于大量的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地望，尤其结合历史情景的

综合分析，最终得出墓主为夏太后的结论，如《汉书》中的“私宫”，秦汉时期的“北宫”指的是后宫，而“乐府”是专属北宫提供歌舞等娱乐的服务机构，当年许卫红研究员曾在秦咸阳城遗址采集到“北宫乐府”铭文的石磬残片，这些均成为指向夏太后的关键线索，符合秦汉时期重视女性地位的社会风气。而且从地望上讲，神禾原秦陵所处位置与文献记载夏太后希望能“东望吾子（秦庄襄王葬芷阳），西望吾夫（秦孝文王葬寿陵）”遗言正相吻合。《史记·秦本纪》有夏太后“独别葬杜东”的记载，恰好与神禾原大墓的地理位置一致，因此发掘团队认为墓主为夏太后是成立的。

科技考古的参与为综合研究提供了科学支撑。神禾原秦陵和大墓的发现，不仅是一次考古上的突破，更是对古代礼仪制度、皇权象征、家族传承的深刻探讨。在从葬坑中发现的古猿个体（骨骸），可能为夏太后生前豢养的珍稀宠物，或象征祥瑞，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认为是全新世灭绝长臂猿，为已灭绝灵长类动物研究提供了重要标本，也进一步说明类似于西汉霸陵陵园的珍稀动物坑布设，早在秦人时期已经出现，为中国古代礼仪“汉承秦制”提供了实物资料。

考古报告对于发掘过程的细节观察、思考和描述清晰。如在M1墓口周围发现白色细腻的白土，没有夯实加工痕迹，从可观察到的迹象分析，该土层与陵园内外不同地层所见土质土色区别明显，应该是通过人为搬运到此的结果。据此发掘者分析认为，这是当大墓和陵园位置确定后，在动土之前用较干净的土整平场地，然后在其上举行祭祀活动，之后才正式放线开挖。这类迹象符合《礼记·祭法》所说的“除地为坛”的功能。像这类“坛场”的发现细节，也给现场考古发掘人员一种提示，发掘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各种迹象，才能不忽略重要遗迹。

成语“一石二鸟”和“一箭双雕”是比喻做一件事会获得两种好结果。神禾原秦陵本是奔着寻找周王陵的初心，而后却依据《史记·秦本纪》“独别葬杜东”的记载，确认是秦的夏太后陵园，不管是周王陵还是秦陵园，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在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展示中定会显示其价值和地位。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

编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5月

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稳定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动植物考古等多学科证据，充分展示了中国食物考古研究的前沿进展。

在研究中，作者强调地区差异和时间变化，避免了将“中国的食物方式”同一化的理解倾向。书中反复指出，在长达数万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地上的不同人群发展出了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和饮食传统。例如，关于公元前3000年气候变化与游牧化问题的讨论中，作者批评了将北方地区简单等同于“游牧民族”的刻板印象，强调考古证据显示当时大多数社会仍以定居农牧兼营为主。

作者将食物置于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家户内食物共享，到晚期的竞争性宴饮，再到青铜时代的等级化消费，食物始终是塑造和表达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商代社会中野生动物消费被限制于精英阶层的现象，以及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在祭祀场合的不同使用，都说明了食物消费与社会身份之间的密切关联。

作为一部面向国际读者的导论性著作，本书在追求全面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在深度上有所取舍。对于中国考古学的专业读者而言，书中的许多案例和论述或许已较为熟悉。此外，南方地区（特别是华南和西南）的材料相对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研究的不均衡状态。在“古代中国”的时间下限问题上，作者选择在周代初收尾，理由是此后文献材料渐趋丰富，且已有相当数量的英文研究成果。然而，从食物方式演变的角度看，东周时期的铁器推广、战国秦汉时期的农业技术革新等议题同样值得深入探讨。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研究填补这一时期的空白。

《古代中国的食物》一书以考古学为主要视角，系统梳理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各地区食物与社会演变历程。作者将食物方式研究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域互动、身份认同等议题有机结合，展示了食物考古在重建古代社会方面的独特价值。本书的出版不仅为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史前食物文化提供了一部可靠的入门读物，也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研究的国际视角。在“食物考古”日益成为考古学重要分支领域的今天，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古代中国的食物》

作者：Yitzchak Jaffe

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久久为功 见人见『制』

陈伟驹

《上古制度》读后

出，现在学界惯用的从随葬品的角度论定王权不一定可靠，而从“独处、独尊、独享的角度论证陵寝制度，进而推导王权的出现”更胜一筹；祭祀遗址包括脱离居住地的公共祭祀场和与村落紧密联系的专用祭祀场，祭祀仪式不是单纯的祈福，而是具有“发展朋友、团结力量，壮大队伍、组织民众”的功能，是一种社会治理体系，乃“国之大事”。

毋庸讳言，在承认《上古制度》创造性地提出众多新论的同时，也要客观地看到，这些新观点也会引出不少新的疑问。

比如，如果认为牛河梁遗址N2Z1为当时的王者及其“陪葬墓”，而反山墓地仅为良渚古城的巫觋集团而非王，就要跳出“单位”的分析，从经济基础和聚落形态等多个层面进行综合分析，排除这一结论可能引发的矛盾。具体来讲，反山文化或者与牛河梁遗址相联系的遗存至今没有发现大规模的城市性聚落，难以确认与王权、

职官制度配套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存在。这一文化或社会的经济形态，尚保留相当比例的渔猎采集成分，是否能支撑其上述的政治体系也是有疑问的。十余年来，良渚古城内外城墙以及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良渚古城作为一个国家形态的产物已经得到公认。而莫角山在良渚古城的中心位置，以及粮仓、码头、大型建筑等发现更是展示出其作为“宫殿”的性质。反山墓地就位于莫角山的西北角，其“王者气派”似乎彰显无遗。如果认为反山墓地不是王陵，而是单纯的巫觋集团，必定还存在地位在其之上的“王陵”。对此，我们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不过，如果反山集团确实作为良渚古城的最高统治者，也不排除其以“巫觋集团”的身份进行统治。就在最近，作者在《牛河梁考古新观察》（《中国文物报》2026年1月24日）一文中提出凌家滩大墓的身份为“巫王合一”，并暗示长江以南存在“巫术王国”的存在可能，即上古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类型。

再如，对于用“家族联盟”代替“氏族”来概括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组织，更多需要古DNA的证据，因为一个村落如果由多个家族组成，到底是用“家族联盟”还是“氏族”更合适，取决于各个家族的血缘关系。近年来，的确有不少古DNA的研究，确认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母系社会。虽然不否认“家族联盟”也可能出现某些新石器时代村落组织特点的要害，但是其与“氏族”概念到底“水火不容”，还是“平分秋色”，是需要继续考量的。

说到结构问题，我对书中各种制度的顺序安排也有一些新的想法。从作者对于各种制度所选取的遗址个案来看，不同制度能够上溯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七、八章的外服制度和仪仗制度，大体对应夏和商时期。将这两种制度排在最后，从年代角度看很合适。但是第六章的祈年制度起源至少早到前仰韶时代，是目前各种制度起源最早的一个，而第一至五章的陵寝、盟誓、联姻、套件和用彩制度，就分析的最早遗址来看，属于仰韶时代或龙山时代。若根据分析的遗址最早年代，可以排出一个新的结构顺序，即：祈年（前仰韶）、盟誓或家族（仰韶早中期）、用彩（仰韶早中期）、陵寝（仰韶中晚期）、套件（仰韶中晚期）、联姻（龙山）、外服（夏）和仪仗（商）。当然，作者将陵寝制度排在第一位，可能是基于王权这一最核心要素的角度考量。

总之，阅读《上古制度》，了解作者的学术历程，我深深感到，这是卜工先生久久为功、见人见“制”之作。尽管书中一些结论尚待更全面和充分的论证，个别结论或可商榷，但是其提倡的深度研究、透物见人、格物见制的目标，一定是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定义为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物质、制度和组织、精神或伦理价值。目前中国的考古学对于物质层面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于精神层面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唯独对于制度层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学者沿着《上古制度》开辟的道路前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上古制度》

作者：卜工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在秦文化遗存类型中，陵园与陵墓系都城的核心构成要素，即“城陵相依”或“陵随都移”。秦的发展过程历经从古国、封国、王国到帝国等几个阶段，其对应着不同的文化遗存类型，自封国时期便开启了秦陵园的建制，秦的社会组织结构开始了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的逐步转变。处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秦陵园，也表现为从集中公墓制向独立陵园制的逐步转型。目前，坐落于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园是具有清晰文献记载和地理标识的独立陵园制之典范，除此之外的众多秦陵园目前尚处于考古发现不完整或正在不断探索中。预计随着今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与秦之社会相匹配的整个秦陵完整体系终将展现，这也应验了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清华大学“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演讲中的预示：“古来新学兴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新近出版发行的《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中的神禾原秦陵便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神禾原秦陵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秦岭北麓的神禾原，该陵园于2004年陕西财经大学基建项目中被考古勘探发现，后经系统发掘，最终确认这是继秦始皇陵园之后又一次关于秦陵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也是迄今我国发掘规模最大的战国时期秦陵园。在《长安神禾原秦陵考古发掘报告》中，详细公布了该陵园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

神禾原是一处结构完整、内涵丰富、保存相对完整的战国时期秦陵园，它的发现至关重要，对于重构完整的秦史，尤其是为秦走向帝国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曾发现并发掘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西世界陵园和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所呈现的是春秋至战国早期“集中公墓制”时期具有周人墓制遗风的陵园结构，而被系统考古勘探发掘过的神禾原秦陵，其考古资料在战国秦陵园史上具有全面、详备、系统和唯一性的特点。发掘者依据墓口处于第一层黑土层下、主墓墓道形状近似梯形的“亚”字形，“独立陵园”制的墓葬规制，判断这里具有战国末期乃至秦汉墓葬的特点，预示着墓葬年代应和秦始皇陵接近。神禾原秦陵园平面布局呈长方形，外沟内垣，内外五门；主要包括“亚”字形大墓、周围13座陪葬坑、园内大型建筑基址群、陵园门阙、相关的冶铸作坊遗迹等，以及道路、排水沟、陵墙、兆沟等设施；陵园规模宏大，要素齐全，布局清晰，构筑有序，时代明确。主墓及从葬坑等虽遭盗掘，但劫后所余随葬品数量依然达2000多件，种类丰富、用材考究、制作精良、工艺高超。文物质地以青铜、金、银、玉器为主，金属器的工艺

近年来，食物考古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在国际学术界蓬勃发展。剑桥大学出版社“食物考古”系列丛书的出版，正是这一学术潮流的重要体现。哈克（Yitzchak Jaffe）博士撰写的《古代中国的食物》（Food in Ancient China）一书，是该系列中首部聚焦中国的著作，为英语世界读者提供了一幅关于中国史前至早期青铜时代食物与社会的宏观图景。

本书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初年，作者采用“食物方式”（foodways）这一核心概念贯穿全书。所谓食物方式，指的是一个社会中与食物相关的所有活动和方面，包括种植、收获、储存、加工、运输、烹饪、消费和丢弃等环节，以及这些环节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仪式等层面。这一视角使得食物研究超越了单纯的饮食史范畴，成为透视古代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

全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讨论“古代中国”的时空范畴，介绍了食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包括动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石器微痕分析等。作者提出，尽管后世的历史文献和图像资料为研究中国食物文化提供了丰富素材，但对于更早的时期，考古学是唯一的信息来源。

第二部分探讨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早期人类依赖狩猎采集为生，鹿类、野马、野牛等大型哺乳动物是主要肉食来源。细石器技术的发展反映了狩猎策略的变化，而磨石器和陶器的出现则标志着食物加工技术的革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南方的洞穴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约2万年前），这些早期陶器可能用于熬煮骨汤、提取油脂，其功能与后来的农业无直接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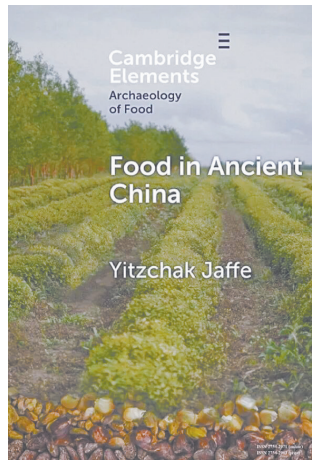
第三部分聚焦农业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约公元前7000年至5000年）。作者详细梳理了粟、黍、稻等主要作物的驯化过程，以及猪、狗等动物的驯养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从野生资源的管理到完全驯化是一个延续数千年的漫长过程，早期农业社会仍大量依赖狩猎采集。不同地区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生计模式：黄河流域以粟黍农业为主，长江流域则以稻作为核心，而东北地区的定居化进程可能更依赖于丰富的野生资源。

第四部分论述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的食物与社会。随着农业逐渐成熟，聚落规模扩大，分布更为密集，社会组织也日趋复杂。作者通过河姆渡、姜寨、牛河梁和西坡等遗址，讨论了稻作和粟作农业的发展、野生资源的持续利用、粮食储藏与共享方式，以及食物在家庭、社区和礼仪活动中的不同作用。与此同时，作者特别强调宴饮与酒精消费的社会意义：

从食物透视古代中国社会

——评《古代中国的食物》

涂栋栋



它们一方面有助于维系共同体整合，另一方面也成为竞争性展示和社会分化的重要媒介。以仰韶晚期西坡遗址为例，部分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酒器、加热装置和大型酿酒容器，表明酒精生产与宴饮活动已成为精英彰显身份、积累威望的重要手段。

第五部分是全书篇幅最大的章节，讨论（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区域互动加剧背景下的社会复杂化、早期城市兴起及其食物基础。作者首先从海岱地区晚大汶口至龙山时期的宴饮、酒精消费与墓葬随葬现象入手，说明食物与饮酒如何逐渐成为精英竞争、社会分化加深的重要媒介。龙山时代也见证了大型聚落的涌现，如石峁、陶寺、良渚等遗址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者分析了城市食物供给问题——大型中心聚落如何获取足够的食物来供养其庞大规模人口，以及城乡之间的食物流动关系。与此同时，绵羊、山羊、牛、马以及小麦、大麦等西亚起源的家畜与作物，经由河西走廊为关键通道的跨区域交流网络进入中国，并在不同地区被选择性吸收，反映出地方社会对新物种和新生计方式的主动调适。

第六部分简要讨论了二里头、郑州商城和殷墟等青铜时代都邑的食物与仪式。商代晚期的殷墟规模宏大，需要从周边地区大量输入动物和谷物以供养其庞大规模人口。青铜礼器的发展使得食物和饮酒成为祭祀仪式的核心，而狩猎则成为精英身份的重要标识。作者在结语中还以西周时期陶器使用方式的地区差异为例，说明即便是在看似统一的器物风格之下，实际的烹饪实践仍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变异。

在本书中，作者成功地将食物考古的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学材料相结合，为英语世界读者提供了一部系统性的导论。书中广泛引用了近年来

本版责编：冯朝晖 丁淑娇 张 宸